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 稷下传习集

袁世硕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傅璇琮 黄霖 罗剑波

# 稷下传习集

袁世硕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稷下传习集/袁世硕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2057-8

I. 稷… II. 袁… III.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清时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2577号

稷下传习集

袁世硕 著

责任编辑/吴 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 字数 230 千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057-8/I·969

定价:50.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古代的文学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从远古朴实的民谣、奇幻的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唐宋古文、元曲、明清小说……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它以无数天才的作家、优美的作品、多变的文体、鲜活的形象、生动的故事、独特的风格与鲜明的民族特点，充分地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人生理想、聪明才智、崇高精神，以及审美情趣与艺术才能。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珍贵的结晶，也是全世界文学之林中耀眼的瑰宝。

有文学，就有欣赏，就有批评，就有研究。早在先秦时代，对文学的批评就随处可见，如《左传》中写到季札在鲁国观乐，对《诗》中的众多作品一一作了点评。后来逐步产生了一批理论批评与研究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到20世纪初，在中西融合、古今通变的潮流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与书写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截至1949年，已陆续产生了一批现代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新中国建立以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近七十

年来,特别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尽管有时也不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与曲折,但总体而言,不论是文献的整理或考辨,还是理论的概括与分析;不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宏观综论,还是对作家或作品的具体探索;不论是沿用传统的方法作研究,还是借用了外来的新论来阐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人才之多、论著之富与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

这批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名家的代表性论著,本身也有学习与传承、总结与研究的重要价值。为此,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倡议与支持下,我们陆续邀请了一批当代在世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实绩、有影响的名家,由他们自选其有代表性的专论结成一集,每集字数在 30 万字左右。第一辑选有十位学者,年龄不等,照顾到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以后将还陆续推出,计划本文库的总量在 50 本左右。

我们相信,本文库的每一集文字都曾经为学术史的推进铺下过坚实的一砖一石,都曾经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过读者的心扉,拨动过大家的心弦。如今重温他们精到的论断、深邃的思考、严密的逻辑、优美的文字,乃至其治学的风范、人格的魅力,都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学习与承传的典范,也为总结与研究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辉煌历史铺路开道。我们这样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希望能推动学界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搞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并积极地去发掘与阐发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从中汲取优秀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美学情趣,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实现中国梦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正当我们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即将付梓问世之时,傅璇琮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突然病逝。在这套丛书的筹划与出版的全过程中,曾得到了病中的傅先生的悉心指导与全力帮助。他的逝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也直接影响了这套丛书的后续工作。我们将沿着既定的思路,编辑与出版好这套丛书,以作为对傅先生永远的纪念。

## 自序

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便与中国古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是民族历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繁多，代有所胜，许多优秀的作品有着长久的生命和魅力。至今依然为人爱读，也时而成为不止学界关注的对象。做教师讲课，更不时受到大学生的质询。这便促使我要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争议的问题做一些思考研讨，常常是先将我的思考在课堂上讲出来，听听学生的反应，觉得言之成理，方才写成文章发表出来。我大半生发表的文章大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即便是从题目看是一般评论一部作品、一个人物形象的文章，那也多是有针对性、有所为而发的，立论中就有驳论的意义在。譬如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写的《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就当时历史学家提出要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却将丑化曹操的罪责归之于《三国演义》，从而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而发的。我考察了曹操由受尊重的魏武帝降落为受贬责的奸雄的历史过程，揭明贬责曹操的倾向是在南宋偏安，理学家们特重春秋大义，书写三国



时代的历史将以往的尊魏改为“帝蜀”的导向下形成的,《三国演义》小说叙写的是宋元人那种历史观念中的三国史,这里面还有民间文艺注入的崇尚智、仁、勇的因素。其次,历史著作与小说性质、功用有所不同,历史著作要真实,写人重在事功(行动作为的客观效果),小说是虚构叙事,写人物重在表现其性情和行为的忠奸善恶,我由此说明《三国演义》写曹操只依旧的道德观念,把他一切行为都归之于“奸”,自然是不科学的。历史学家要摆脱宋元以来小说、戏曲的影响,对历史人物做出科学的评价,完全正确;然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形象,也还是反映出了古代成功的政治家最典型的性格和政治行为的机变智巧,而且还是十分生动鲜活,有其文学的价值功能,不应该否定扬弃,也不会被否定扬弃掉的。《贾宝玉心解》是由红楼梦研究中扬弃了自传说之后又发生了贾宝玉是不是“封建叛逆者”或曰“新人”的问题而发的。我从正反两种意见中悟出:意见分歧的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小说人物贾宝玉的文学素质,他不是个写实小说中等同现实人的仿真型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其中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向化的因素,如性情超常,说了些“囫圇不可解”却意蕴甚深的话语,曲折地反映出作者的心灵。如果全用现实的眼光、准则品评其举止、话语,就失于胶柱鼓瑟,没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称扬者说不到家,贬之者则显得非常迂阔。

中国学术传统很早便有“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的历史主义原则。我本着这条原则,发觉明代中叶文学呈现出了一股强烈的重情尚欲反禁欲主义的思潮,对《西游记》小说也做出了新的诠释。《西游记》小说历来是众说纷纭,如果仅从时代不同、读者观点不同去解释,即便做得十分周到仔细,那也不能解决怎么看待这部神魔小说的根本问题。我就小说史家已做的《西游记》故事的演化的研究,用历史的和文学的方法,得出了这样的认知:唐高僧玄奘取经的事迹,在通俗文艺中神魔故事化,原初的弘佛的宗旨,逐渐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冲淡,道教神仙进入佛家故事,内容便复杂起来,连取经的主角都发生移位,到明中期受到了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的浸洗,重新书写的取经故事发生

了内在肌质的裂变,主体故事与具体情节的描写呈现出不和谐一致的倾向性,神佛有了世俗相,连同取经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揶揄、戏谑,呈现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是《西游记》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特征。历来的批评家忽视了这一本质特征,用各自时代的流行观念,强行总结小说的主题思想,自然是不合实际,难于自圆其说了。

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我对《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平事迹,做了深入细微的研究,稽考出一些与《聊斋志异》创作相关的人事。《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具有作者自况、自悲、自娱的性质,狐鬼故事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学表现方式,便觉出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聊斋志异》做出的几十年来屡屡为研究者称引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论断,不够确切了。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神鬼怪异之事是作者记述的内容,以“明神道之不诬”,而蒲松龄结撰狐鬼花妖的故事,作为抒情言志的方式,具有了形式、手法的性质,原有的神秘性也就被文学的审美性所取代。这就不仅揭明了《聊斋志异》与前出的志怪小说的根本差别,也明白了在文学发展中原本迷信观念中的“事物”在人们逐渐摆脱迷信意识后,依然不会完全消失的缘故。现代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就是这样的。

由此,我进而感觉到研究、诠释、评论作品自然是古代文学研究最基本的任务,也可以扩展到对文学的历史演变现象和规律的认识。于是研讨了中国文学史中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揭示出了宗教与文学由同源到互渗互用,最后宗教材料成为文学表现手法的演变历程。这便走进了理论。

由于长时间潜沉在古代文学研究,也不时地阅读些文学理论书,有的受益,有的不以为是。近些年来,西方的接受美学在中国颇受欢迎,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用其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促使我去阅读其代表性的论著的中文译本,读后发觉: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是抬高读者在接受中的地位,放逐作品文本,不承认文本有既定的思想意义,而展开论述其理论却又返回文本,几乎是每一步都没有离开文本。其中有些论述是不错的,但是,如有的理论家为抬高读者的



能力,把“读者”的概念缩小为“有知识的读者”,有语言知识、懂得文学,便能很好地理解作品,破解文本“未定”的意思。这不就完全回到了他们所反对的传统批评理论!反而可以作为批驳他们的接受理论的论据。我写了《接受理论的悖论》,自己觉得是抓住了接受美学的软肋,不能说完全深刻,却可以让接受美学热降降温。这是我在问题意识引导下做的一次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交流。

这本自选集选入的是我 60 年来所作、标志着我治学的特点和历程的文章,算不上什么学术成就,不过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罢了。这些文章如仍能对读者有所启发,也就足堪欣慰了。

# 目 录

自序 .....	1
第一辑 问题意识引导下的小说评论 .....	1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	3
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 ——就《西游记》前七回说 .....	21
《金瓶梅》平议 .....	30
《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及其性质问题 .....	45
贾宝玉心解 .....	68
第二辑 作家研究与解析作品——就《聊斋志异》谈 .....	81
蒲松龄与张笃庆 .....	83
蒲松龄与孙蕙 ——南游行迹与顾青霞 .....	103

2 稷下传习集

蒲松龄在西铺毕家 .....	125
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 .....	150
《聊斋志异》的志怪新质 .....	178
<b>第三辑 走向理论</b> .....	199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	201
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 .....	213
文学史中的哲学与文学 .....	229
文学史中宗教与文学的互动互渗 .....	240
接受理论的悖论 .....	255
<b>袁世硕学术编年</b> .....	275

# 第一辑

## 问题意识引导下的小说评论

-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 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
- 《金瓶梅》平议
- 《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及其性质问题
- 贾宝玉心解



##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在最近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中,有不少的学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三国演义》。有人认为,只有打倒了《三国演义》,才能还历史人物曹操以本来的面目。这种意见的提出,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那就是《三国演义》过去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要使人们对于曹操的认识完全摆脱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的确是需要费许多唇舌和一定的时间的。既然许多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曹操在他的时代里是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他所实施的一些政治、经济上的政策,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那么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对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个正确的认识,也的确是一件极必要、极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历史知识,我是极端贫乏的,可以说是完全无知。因此,对于历史问题,也就没有发言的权利和资格。

但是,认为要替曹操翻案,就必须打倒《三国演义》,要肯定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就必须毁灭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艺术形象,这就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我觉得,这就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和作为艺术形象的评价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了。它们之间,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在过去;然而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对于具有新的科学观点的人来说。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下面,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肤浅的意见。

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的形成问题,讨论一下曹操这个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问题,他脸上的白粉究竟是谁给抹上去的?二是通过对于曹



操这个艺术形象的简单分析,讨论一下它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如果肯定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艺术形象是否就完全失掉了真实性,就必须毁灭掉,再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呢?



许多研究《三国演义》的论著里,大都有论述《三国演义》的题材的演化这样一个节目。不少的研究者认为,三国故事的广泛流传是晚唐开始的事情。李商隐的《骄儿诗》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便是人所必引的最早的材料。不少的研究者还认为,《三国演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是始于宋代。在最近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中,有的作者认为,把曹操描写成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是小说家、戏曲家在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和倡导下所干的可恶的勾当。照这种意见看来,仿佛《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应该是歪曲曹操的第一大罪人了。

以上这些意见,我觉得是不够那么正确,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意见的提出,仿佛是轻率的,没有经过多么冷静、仔细的钻研。

三国故事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流传,恐怕不见得是晚唐才开始的事情。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之后不久,便逐渐广泛地流传开来了。最早的自然仅只是几个主要人物如诸葛亮、曹操诸人的某些故事。如陈寿在三国时代还未结束的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订《诸葛亮集》完成后特地向皇帝上的表中,就有这样的几句话:

青龙二年(234)……秋,(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三国志》卷三十五)

裴注里摘引的晋人袁准(孝尼)对于诸葛亮的一段评论中,也有几句类

似的话。可见,在那个时候,诸葛亮的许多逸事,至少在四川、陕西一带,便已经成为广大群众所乐于谈论、传述的对象了。在不断的谈论、传述中,就不免逐渐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的滋润、哺育,而有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自然是所谓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的加工。这是不是纯主观的臆断呢?不是的,魏晋时期的人所写的某些稗史、杂录,便可证明。

魏晋时期,曾出现了许多记述三国时代的史实和人物传记、佚事的著作,如司马彪的《九州春秋》、袁曜的《献帝春秋》、孙盛的《魏氏春秋》和《异同杂语》、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郭班的《世语》、作者佚名的《曹瞒传》、《魏武故事》和《英雄记》,等等。这些稗史、杂录虽然是早已散佚了,但裴松之却做了一件大好事,弥补了这个损失。他嫌陈寿的《三国志》比较“略”、“漏”,便博采魏晋以来有关三国的各种遗闻、佚事,将那许多稗史、杂录中的他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材料,都摘引了下来,给陈志做出了数字相当于正文的注。这对于保存关于三国的资料(包括史实和传说),使三国故事的流传得到了文字的凭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从《三国志》裴注中所摘录的这许多材料看来,里面有的已明显地具有了故事传说的性质。例如《蜀记》中记载的晋初郭冲所言诸葛亮在阳平用计败走司马懿的事: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三国志》卷三十五注)

这不是明显地带有夸张性质、传奇色彩的空城计的故事吗！其他如《汉晋春秋》中所记“死诸葛走生仲达”的事；《吴历》中所记刘备在许昌为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以为韬晦之计的事；特别是《曹瞒传》中所记载的曹操所做的许多酷虐变诈的事情，等等，也显然都不是纯客观的史实，而带有一定程度的故事传说的性质。事实上，《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在魏晋时期那些稗史、杂录中，都已经初具雏形了。因此，我们说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之后不久，便开始并且逐渐广泛地流传起来，同时逐渐地在流传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所谓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的加工，也就不能算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了。

《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恐怕也未必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始于宋代。那种仅仅把唐、宋两代的文人诗文中的曹操加以比照，从而便得出曹操从宋代开始方才被画成为一个大白脸的坏蛋的结论，看来也是不完全正确的。上面我们提及的魏晋时期的人写那些稗史、杂录，从《三国志》裴注中摘录的那些材料看，它们对于魏、蜀、吴三国的态度，就彼此不同。虽然有的是表现了比较客观的态度，但不少的都表现了明显的或尊魏或尊蜀的倾向。自然也有的是把同情放在了东吴方面，但主要的是上两种倾向。它们对于三国时代的那几个主脑人物爱憎、褒贬的态度，表现得就更为明显。特别是对于曹操的态度，分歧很大，对立得非常鲜明、尖锐。有的是一味地颂扬，只写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美德，像《魏书》《魏武故事》等就属于这一类；有的就竭力诋毁，只写他的罪行、恶德，如《曹瞒传》便是集中地写了他的许多酷虐变诈的行事。《曹瞒传》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它不仅为后来罗贯中创造曹操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所写的曹操的许多酷虐变诈之事，如假装中风来破坏其父、叔的关系，“割发代首”，借杀无辜的粮官以息兵怨，逼杀伏后，等等，都被罗贯中吸收到了《三国演义》中去，而且也已经初步地规定了曹操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的性格，与后来人们心目中的曹操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曹操脸上的白粉真的是后人给抹上去的，那么《曹瞒传》的作者就应该算是始作俑者了。